

第9卷

◎顾问
李 新
廖盖隆



动乱年代

李作民 王 前 张晓峰 / 著

1966-1976

966-1976

中国

第9卷

20世纪
全史

动乱年代

李作民 王 前 张晓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动乱年代/李作民, 王前, 张晓峰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中国 20 世纪全史 第 9 卷)

ISBN 7-5006-4263-6

I. 动… II. ①李… ②王… ③张… III. 文化大革命
IV. 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900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发行部电话: (010) 64010813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26.25 印张 5 插页 650 千字

200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65.00 元

本图书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引言 风起于青苹之末

楚国大夫宋玉陪襄王游玩于宫中，遇风而发宏论，是谓《风赋》。遂留传世佳句：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

古人对自然之风从生发而终成狂飙过程的观察和描述，不失细腻、形象和逼真。

社会之风，竟有雷同。

10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自60年代以来政治上“左”倾错误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唯物辩证法阐释“质量互变规律”，认为质的飞跃由量的积累引起，量变达到临界点，方可并必然引起质变。

使人略感惊诧的是，有几位醉心于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的西方学者，在试图揭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一基本规律——尽管他们从未承认过对唯物辩证法的崇拜。

在笔者案头，摆放着几部西方汉学家（他们常以此自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著作。这是许多人所熟知的由费正清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独立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及由斯图尔特·施拉姆撰写的《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施拉姆集》等。

三位“汉学家”被公认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而且他们的研究态度和成果,也被认为是比较严肃的。笔者在拜读他们的著作(不仅是所列举的这几部)时,发觉他们在试图解读“文化大革命”的谜团时,几乎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拉回到中国的五六十年代。或许是受了中国学者若干观点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尽然。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就开始做这种研究尝试了。

1973年,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付梓,该卷篇名为《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在该卷前言中他写道: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已意识到,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得到大量新文献,我断定,把当代和文化大革命所透露的材料结合起来就有可能从1956—1965年的历史中追溯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①

在该卷导言中,他又写了同样意思的话:

“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毛试图为中国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它代表了一生为了中国革命而思考和工作的毛的高峰时期。但是促使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酝酿过程是从1956年的事件开始的。”

该书的中译本,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3月出版。

但是,笔者仍然认为,西方学者的见解,归根结底是受了中国人的启发。翻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件、讲话、文章,几乎随处可见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解释,而其中最权威的,当属1969年4月1日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九大”所做的政治报告。报告专用两节回顾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准备”一节写道:

^① 1969年,他曾到哥伦比亚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作者注。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之后，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它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向，也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过程”一节中写道：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起了进攻……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这个报告追溯历史时，还写着几件大事：反右派运动、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争论、关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大辩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际国内反修运动等等。报告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举措，并由此断言：“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

报告充满牵强附会和混淆视听之词，自不待说。至于把“样板

戏”也搬出来讴歌,那是为了在党的史册上给江青记上一笔,用意更不待说。但是,报告毕竟给后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缘起提供了重要线索。

谁能说西方“汉学家”们不是从中受到启迪呢?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似乎不必回头走那么远,更直接地或更主要地说,“文化大革命”来源于60年代之后党在政治上“左”倾错误的逐步升级、积累和恶性发展。

究竟彼时有什么问题制约影响着全党特别是毛泽东的思维?全党特别是毛泽东的思维领域之内,最根本地反作用于实践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简言之,是强烈的政治危机感或者说是“政治恐慌”。

这种强烈的政治危机感或“政治恐慌”,主要由两个因素引发:外部来自于苏联的赫鲁晓夫的压力,内部来自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与毛泽东相左的主张。

说到底,担心中国党步赫鲁晓夫后尘,成为修正主义的党,断绝马列主义命脉;担心中国步苏联后尘,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葬送社会主义前程。

中苏失和,起于苏共“二十大”,裂痕扩大并日渐公开化,则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此行的重要目的,是与苏共交换意见,寻求弥合裂痕的途径。这是中苏两党有约在先的。但赫鲁晓夫在完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向各党代表团散发并宣读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把1956年以来中苏两党的分歧和内部争论公布在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中共代表团坚决反击。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不欢而散。

东欧的6月,气候宜人,但中苏两党的关系,却由此进入严冬季节。

中苏失和,原因复杂,既有国家关系中的芥蒂,又有意识形态的争执,但直接的起因还是后者。在这套丛书的前一卷中,有对中苏论战较为详尽的评述。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中苏之间之所以爆发了后来旷日持久的大论战,就中国党而言,是因为对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的内外政策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苏共全面地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走上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道路。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方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就是围绕这个基本判断而全面阐述中共看法的。

如果说仅仅是着眼于对苏共路线进行批判,以澄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是非曲直,那么,这场国际反修运动,尚不致引发中国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的“文化大革命”。仅仅在这二者之间,还难以找到直接的因果联系。它们之间必有中介结构。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给我们提示了这一中介结构的含义。

文章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之后,把主题转向中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也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从而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文章把毛泽东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概括为15条。

第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承认并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第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

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

第四,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作为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对社会主义社会做阶级分析,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团结教育人民,打败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进攻。

第七,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第八,人民公社是集体的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发展,以及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的“兴无灭资”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开展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取消高薪制,缩小国家工作人员与群众的收入差距,防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第十五，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解决好培养接班人问题。

文章的结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原则，“对于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按照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援助世界各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运动，并且保证在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文化大革命”中被概括的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六条，其雏形就在这里。

这就是从国际反修到国内“文化大革命”之间的中介结构——防止中国重蹈苏联覆辙。

其实，这个中介结构，早在此前就开始运作了。

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向党内打招呼，要警惕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的图谋。但是，真正担心党内要出问题，还是在提出“三面红旗”之后。

1958年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高举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这是全党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付出的真诚和艰辛的努力。它反映了党和人民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表现出党在苏联模式“失灵”之后，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定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勇气。但是，由于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基本国情，也由于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和操作偏差，“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失利。

反思中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的争论，绝不是两人之间的“芥蒂”，而是以他们

两人为代表的党内两种意见、两种声音的“合奏”。毛泽东对党的担忧，恐怕是从这时开始的，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是由此而发轫的。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①

“该当”神州有事，赫鲁晓夫们也反对“三面红旗”。1959年又成“多事之秋”。

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给《诗刊》编辑部送去《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诗，并写了封信，“向全世界作战”：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王）八蛋的。^②

① 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② 毛泽东：《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1959年9月1日）。

彭德怀受了“连坐”，被挂到赫鲁晓夫们那里。1960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时，直称彭德怀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者”。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阶级、形势和矛盾”总题目下大批特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这是庐山那场争论的继续。

不管是庐山会议期间，还是从庐山会议之后到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党内都没有人公开向“三面红旗”下战书。但是，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又风风联系着“三面红旗”，联系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分歧。在当时，尚难以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层面去审视“三面红旗”的迷误所在，但绝不等于党内没有人对“三面红旗”产生过疑问。发问者除“彭、黄、张、周”之外，在中央领导核心中，恐怕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如果说党内有人一直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上审视“三面红旗”的话，应当首推毛泽东。他是“三面红旗”最坚定的捍卫者，并且他一直是捍卫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的理性高度去捍卫“三面红旗”的。但是，这种理解，又恰恰是失当的。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认识过程，无论是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全党。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了一个颇有见地和启迪的看法。他认为，10年探索中的正确发展趋向和错误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这是对整个10年探索期间党的思维特征的判断，但也适用于此处。“三面红旗”是全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旗帜，但

是，当党以此引导人民沿着这条道路探索和跋涉时，却总是磕磕绊绊，步履维艰。一方面不得不纠“左”，另一方面又不能玷污了自己树立的旗帜；一方面尝试突破苏联经典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又不可动摇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其中有许多是被误解或教条化地理解的）。二者之间，时时发生冲突。这是一个两难选题，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毛泽东要走出两难，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全力捍卫被他当做是社会主义原则的那些东西，向“党内修正主义”宣战，把全党思想重新统一到“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来。

全党接受了他的理论，但这却是一个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泥淖。

这是重新启动阶级斗争工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反修防修斗争的国内背景。

在国际国内两个战场先后发起的反修防修斗争，一则有喜，一则有忧。喜的是反修防修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真正达到了渗入一切领域和深入人心的地步。忧的是越反越有危机感，反着国际的，想着党内的，挖着基层的，盯着上边的，似乎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党变修、国变色的可能性越来越临近。

终于，毛泽东发出了“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严重警告。1964年以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在与外国党的一些领导人的谈话和党内会议上，多次说到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而且他主要不是指下层，是专指中央的。

至少有两次吹风是给党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1964年6月，另一次是1965年9月。

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6月8日，在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讲国内党内问题时说过一句话：传下去，传到县，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1965年九十月间,又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老话重提,又一次发问。那是在工作会议期间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问与会者:“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①

一年前似乎是一种“预报”,说得不十分肯定,但担忧已经产生。而这次则不然,一个“很可能”,已经带有肯定的语气。他还对与会的大区主要领导们说: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不要迷信中央”——主要是指不要迷信刘少奇。可以做这种判断。年初,为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毛泽东曾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四清”中的思路和做法。后来,他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埃德加·斯诺说,就是从那时开始觉得,应当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因为他认为,刘少奇推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一场政治狂飙,终于不可避免了。

这场狂飙,所以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它发端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领域,而且是先从这一领域实施“外科手术”式的“革命”的。与国内反修防修运动同时兴起的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政治批判,成了这场“革命”的导火线,但它仅仅是导火线而已,毛泽东的目光,始终是紧紧盯着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要解决文化问题,而是要解决政治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把它称之为“政治大革命”。但是,如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

^① 《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

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为了永远汲取教训，我们将与读者共同翻开那沉重的一页。

《中国二十世纪全史》

顾 问

李 新 廖盖隆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刘益涛

策 划

胡守文

特约审稿

蔡 云 林君雄 滕明道 王溪元 李 萍

责任编辑

冈 宁

1900-2000

目 录

引 言 风起于青萍之末·····	(1)
第一章 狂飙骤起·····	(1)
一、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五·一六通知》·····	(1)
二、政变?! 林彪“五·一八”讲话·····	(14)
三、“彭、罗、陆、杨”遭劫·····	(23)
第二章 天下大乱·····	(37)
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37)
二、红卫兵——从神话中走来的孙悟空·····	(50)
三、措手不及的中央一线·····	(69)
四、工作组——传统与现实的冲突·····	(76)
五、毛泽东：“凭阑静听潇潇雨”·····	(91)
第三章 “炮打司令部”·····	(101)
一、毛泽东回京整理局面·····	(101)
二、八届十一中全会·····	(111)
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22)
四、“大串连”——毛泽东迎接 1000 万“客人”进京·····	(134)
五、“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与令人“讨嫌”的个人崇拜·····	(149)
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60)
七、直接诉诸群众——毛泽东的新思维·····	(174)
第四章 全面夺权·····	(184)
一、“一月革命”·····	(184)